

20世紀の中国システム

二十世紀

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三

# 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日〕石川禎浩／主编  
袁广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 (日) 石川祯浩主编;  
袁广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3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4269 - 3

I. ①二… II. ①石… ②袁… III. ①社会发展史 -  
研究 - 中国 - 20 世纪 ②文化史 - 研究 - 中国 - 20 世纪  
IV. ①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3267 号

##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三 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主 编 / [日] 石川祯浩  
译 者 / 袁广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张晓川 徐碧姝

责任校对 / 张兰春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版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269 - 3

定 价 / 79.00 元

印 张 / 25.4

字 数 / 441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日文版序言

本书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人文研”）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共同研究组（组长石川禎浩）的成果报告论文集。该研究组始自2006年4月，历时四年，2010年3月结束。研究组开始时为人文研东方学研究部门的一部分；2007年4月，研究所成立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组遂转属该中心，并作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现代中国区域研究京都大学基地的第一课题组，承担该机构与京都大学合作开展的研究任务。

自1966年开始“辛亥革命研究”以来，人文研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共同研究组虽课题屡有更替，但未曾中断。狭间直树教授在主持多个课题的共同研究后，于2001年3月退休，其后由森时彦教授继续主持“中国近代化的动态构造”研究组（1998～2003年），“20世纪中国的社会体系”研究组的研究会也隔周召开一次；而与之并行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森教授主持的研究组有成员近50名，每人发表机会较少；启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即为弥补此缺憾，以吸纳更多学者参与共同研究。森教授的研究组重点探讨社会经济，新研究组则将焦点对准文化、思想、

政治方面。以“社会主义文化”为课题名称，理由在此。

关于该新研究组的研究意图，我曾在研究组启动之初这样写道：

冷战体制结束后，所谓“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衰退。但是，中国经数十年积淀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及意识形态依然根深蒂固。大型宣传画、标语等仍随处可见，就是明显佐证。而且，随着经济方面的不断开放，“社会主义文化”还承担了维持体制的文化防波堤的作用，继续影响着一般民众的思考方式，规定着现存体制的文化政策方向，也制约着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记述。

本研究组将以社会主义思想在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以至今日的约一百年为尺度，应用史学方法，从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对中国的上述社会主义文化现象进行探究。就中国共产党而言，除探讨有关史实外，还将研究历史记述的变化，亦即共产党曾经如何表述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另外，清末及民国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930 年代的左翼文化、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共和国时期学术领域及学术规范的变化以及文学、艺术等，也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密切关系，当然也都在研究对象之列。尤需指出的是日中两国在此方面的文化交流，即 20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演变，既曾受到同时代日本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也对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等文化史产生过巨大影响。上述 20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各种现象，都是本研究组将以历史观点进行探究的对象。

上述研究意图实现了多少，还请读者通过本书收录的 16 篇论文来评判；编者要说的是，研究组历时四年，召开研究会计 61 次，每次报告和讨论的内容都十分丰富。特别是杨奎松（北京大学历史系，2007 年）、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2008 年）和汪朝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9年)三位先生,曾作为客座教授分别在人文研工作半年,其间三位先生和其他成员在本研究组所作报告,以及围绕报告所作讨论,皆用汉语进行,得各位协助,每次研究会都非常充实。

自2007年度起,在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和京都大学的合作框架下,本研究组作为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组成部分得到经费补助,有条件邀请远方学者前来作研究报告或讲评,从而使研究活动扩展到关西以外地区。四年间召开的正式研究会的报告者及其题目,刊载于《东方学报》第80~85册(2007年3月至2010年3月)的汇报栏;2007年度以后的,则请参见人文研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网页(<http://www.zinbun.kyoto-u.ac.jp/~rcmcc/group107.htm>)。本研究组在本年3月拥有的成员,除本书收入论文的16名外,还有岩井茂树、王雪萍、王兰、绪形康、川尻文彦、菊池一隆、久保纯太郎、佐原阳子、濑户宏、束洪芬、泷田豪、竹内理桦、武上真理子、田中刚、田中仁、田边章秀、张雯、郑乐静、中村元哉、箱田惠子、细见和弘、丸田孝志、水野直树、水羽信男、宫内肇、村田省一、森时彦、森纪子、山崎岳、刘守军。

本研究组的研究会,隔周一次,于周五下午两点至五点在人文研主馆召开(2007年前在西馆会议室,研究所搬迁后,自2008年1月始改在主馆研讨室)。由于与森教授现在主持的“长江流域社会的历史景观”研究组在周五交替进行,2001年3月前每周皆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会的状况得以恢复,与森教授的研究组共同发挥了关西地区中国近现代史国际共同研究基地的功能。这四年间应邀来访并在本研究组或作研究报告、或进行讲演的外国学者有:崔凤春(广西师范大学教授)、曲晓范(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景岚(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汎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陈永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Joshua Fogel(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学部教授)、杨瑞松(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佑吉(韩国鲜文大学国际学部副教

授)、Sebastian Veg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香港] 研究员)、关晓红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Gotelind Müller-Saini (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周尚文 (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张陟遥 (扬州大学政治系讲师)、王萌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潘光哲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章清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福泉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桂芳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Dick Stegewerns (奥斯陆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金世昊 (韩国韩南大学校师范大学教授)、赵燕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何培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部副主任)、解莉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亚非处处长)、朱荫贵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长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Sergey Vradiy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马骏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HESS] 研究生)、徐有威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胡成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佑新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中心教授)、郭岱君 (Kuo Tai-chun,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

2006年4月组织本研究组时,人文研仅有森时彦教授和我二人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而成为专任成员。我由于初次主持研究组,经验不足,故研究组的组织方面多有欠缺。2007年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袁广泉先生作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区域研究促进中心研究员和京都大学人文研客座副教授到任;翌年4月又有小野寺史郎先生充任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助教。得此二位协助,研究活动得到大幅充实。2008年人文研搬迁后,在新址四楼附设了现代中国共同研究室、现代中国信息资料收藏基地(主要收藏清末、民国的报刊和新编地方志),研究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现代中国共同研究室不仅是政府、产业、大学联合研究员(日语称呼:产学官连携研究员)的研究场所,还接受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以及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在此研究深造——前者有韩燕丽、箱田惠子、宫原佳昭,后者则有柴田阳一、岛田美和等。本研究组的研究活动如此

活跃，实是拜这些研究员及各位成员通力合作所赐。

本书所收 16 篇论文，曾分别委托研究组成员袁广泉、小野寺史郎、濑户宏、濑边启子、高岛航等各位审稿，小野寺还承担了最终文字校正工作。本书刊行后，所收论文将制作成 PDF 文档在互联网上公开。本书出版使用了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区域研究促进事业经费，即与京都大学的合作“从人文学视角分析现代中国的深层结构”项目经费。对于该机构大力支持人文学基础研究，再次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该合作项目长续不辍。

石川 禎浩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2010 年 4 月 28 日



# 目 录

日文版序言 .....	1
寻求描写“社会”的方法	
——从“写实”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森冈优纪 / 1
1920年代中国女性剪发	
——舆论·时尚·革命 .....	高岛航 / 28
中国近代国画的理论探索	
——徐悲鸿和余绍宋 .....	中村哲夫 / 68
再论国防电影 .....	韩燕丽 / 105
韦君宜与《文艺学习》杂志 .....	楠原俊代 / 125
走进“信仰”的年代：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初探 ...	石川禎浩 / 168
文革时期“手抄本”小说的流传概况 .....	濑边启子 / 193
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 .....	金文京 / 223
民国初期地方教育界人士关心的问题	
——湖南省教育会与易克臬的教育主张 .....	宫原佳昭 / 244
“满洲国”的地理学者及其活动特征 .....	柴田阳一 / 273
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内蒙自治辩论 .....	岛田美和 / 326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歌和国歌 .....	小野寺史郎 / 352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

——“现状”与“过去” …………… 江田宪治 / 382

中兴煤矿没收事件始末

——北伐战争就地筹饷及民营企业的抵制 …………… 袁广泉 / 402

转折时期国民政府对苏与对美政策之关系

——以 1947 年中期为中心 …………… 吉田丰子 / 442

如履薄冰的备忘录贸易谈判

——古井喜实和 1969 年的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 …… 鹿雪莹 / 466

# 寻求描写“社会”的方法

——从“写实”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森冈优纪\*

## 一 序言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一口号，是1932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大会”为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提出的，在30年代就传到了中国。积极向国内介绍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周扬曾介绍说，在“文学的真实性”方面，苏联正在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说社会主义的真实是通过“典型”来描写的，而其重要特征则在于大众性、单纯性。在这里，周扬已经谈到描写“典型”这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核心。<sup>①</sup>

30年代在将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引入中国过程中同样发挥了较大影响的胡风，则在《关于创作经验》一文中，就如何创造“典型”作了更详细的论述。<sup>②</sup>在《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

---

\* 森冈优纪，京都大学博士研究生。

① 周扬：《文学的真实性》，《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1日，参照《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② 胡风：《关于创作经验》（1935年1月28日），参照《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中，胡风引用恩格斯有关“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论述，并以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为例，分五个方面整理了“典型”人物的性格。<sup>①</sup>首先，论述的是人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比如阿Q，他作为“辛亥革命前后以及现在的少数落后地方的农村无产者”，其性格是普遍的；而相对于“商人群地主群工人群或各个商人各个地主各个工人以及现在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里的农民”，其性格则又是特殊的。其次，必须抽取并描写特定社会群体里的每一个体共通且必定具备的特征。其三，历史条件是有界限的，不能无视、混淆各种时代和阶级的界限来创造人物。其四，创造人物必须反映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五，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描写未来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人物，也是重要的。胡风并说应该积极地创造“典型”；而较之以前的文学评论，“典型”这一概念的不同之处如下：

还有一种误解，或者以为典型所包含的是永久的“人性”，（中略）或者以为典型所包含的是“国民性”，例如阿Q代表了中国人。这是很有害的误解，却正是最流行最有势力的意见。然而，我们通常所说某人是哈孟雷特，某人是×××，第一，大多数是在“比拟”的意义上说的，第二，创造了我们所有的文学典型的社会——由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烂熟期，现在还是大同小异地或变相地存在，因而他们所代表的个体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散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误解是因为不了解典型底对于他所代表的社会群以外的社会群的特殊性，我明确地指出阿Q是落后的浮浪人（Lumpen）中国贫农底典型，就是因为这个原故。

关于阿Q，茅盾曾于1923年在《读〈呐喊〉》一文中作过如

---

<sup>①</sup> 胡风：《什么是“典型”和“类型”》（1935年5月26日），参照《胡风评论集（上）》。

下论述：

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我以为这就是《阿Q正传》之所以可贵，恐怕也就是《阿Q正传》流行极广的主要原因。<sup>①</sup>

茅盾的意见，大致代表了文坛当时对阿Q的一般想法。但胡风在《典型论底混乱》中却提出了不同观点。对于认为“阿Q”这一人物形象代表了中国人普遍具有的特征这一意见，胡风说实际上并非如此。他说，阿Q表现出的是中国农村中比佃农地位更低的无业游民的特点，而不是一般农民以及全体中国人的特征：

第二，阿Q底作者说阿Q不是纯粹的农民，这在什么地方说的我不知道，但我以为并不难懂。我说阿Q所代表的是他“那一类的农民”，也就是落后的带浮浪人（Lumpen）性的中国贫农；作者说他不是纯粹的农民，我想不外指的是他和佃农自耕农富农等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的不同。所以，阿Q底浮浪人性虽然对于那些农民是特殊的，但对于他所代表的“那一类的农民”却一定是普通的。<sup>②</sup>

从关于阿Q的论争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所谓“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实际是从社会结构角度解释小说范畴的方法论。胡风首先把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分为富农、自耕农、佃农和地位更低的雇农。所谓雇农，指那些居无定所、只在农忙时节住到地

① 茅盾：《读〈呐喊〉》，《文学周报》1923年10月8日，参照《茅盾全集18》，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② 胡风：《典型论底混乱》，1936年1月5日、6日，参照《胡风评论集（上）》。

主家里帮工的农民，距无业游民仅一步之遥。在如此分析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分别创作各阶层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物形象，这就是所谓“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不用说，该理论有一个前提，即依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进行社会分析。比如，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中认为，初期的现实主义是于18世纪中叶在欧洲随着市民社会的勃兴而发展起来的，以描写新兴市民的家庭生活、风俗、道德为主题。到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胆地描写社会的缺陷和矛盾，达到了暴露丑恶社会现实的高峰；但由于作家们对自己所属阶级缺乏自觉，因而随着市民社会的颓废，其现实主义也走向衰退。新的现实主义唯有待到具备了工人阶级世界观才可能出现。<sup>①</sup>

可见，在3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开始迅速传播的同时，“现实主义（Realism）”也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倡导下，开始深刻影响中国的文艺创作。<sup>②</sup>“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流派名称而确立，也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被接受有关。五四时期，翻译“Realism”时极少使用“现实主义”，而多用“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等；“现实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的过程中取代“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而成为通用词的。<sup>③</sup>瞿秋白自1932年初开始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

① 周扬：《现实主义试论》，《文学》第6卷第1号，1936年1月1日，参照《周扬文集》第1卷。

②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③ 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始于翻译日本共产党机关报。1933年2月的《艺术新闻》（第2期）转载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プロレタリア文学）》2月号的《苏联文学新口号（ソ連文学の新しいスローガン）》，同年7月1日创刊的《文学》之“苏联通信”栏则介绍了久野三郎的文章的译文《社会主义的写实》（《文化集体》第7、8期，1933年）。后来，《国际每日文选》第37号（1933年9月6日）和第51号（1933年9月20日）还刊登了《关于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一文。可见，这个时期，“社会主义 Realism”仍被译作“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周扬等人倡导下被接受的过程中，“现实主义”作为“Realism”的译词，逐步取代了“自然主义”“写实主义”。

义文艺理论著作，周扬则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得到正式承认；“现实主义”一词就是在那之后逐渐确立下来的。<sup>①</sup>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何以在30年代为众多中国读者所接受，陈顺馨在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换》中认为有三个内在原因。第一，“五四”精神所代表的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第二，中国对苏联文学理解较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效用给了中国现实以指针；第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Realism 传统（指源于“为人生”口号的 Realism）。所谓“为人生”，意味着作家采取这样一种创作态度，即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受封建传统社会压迫的民众的生活。陈顺馨认为此三者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接受的最重要原因。

认为30年代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因在于五四时期的文化积淀，这一观点大多得自于两方面的考察。其一是小说的社会效用；如上述陈顺馨的观点就是，五四时期的文学观是中国毫无阻碍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重要原因。其二是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和3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所具有的连续性。<sup>②</sup>

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化积淀使中国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可能这一观点，笔者也赞同；但本文拟专从文艺理论本身的积累发展过程这一角度对此作进一步探讨。也就是说，笔者不是将现实主义置于政治磁场来论述，而是将其放在五四时期至20年代文艺理论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把握。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已经直接用原文阅读海外文献，他们积极地接受西方文学及西方文艺理论。到了

① 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1日，参照《周扬文集》第1卷。

② 参照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及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换》。

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短期内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他们在接受该理论之前已对西方文艺理论具备较深素养不无关系。本文试图探讨的是，五四时期逐步积累起来的关于近代小说的认知和理论，对于之后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体起到了哪些影响。

3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五四时期至20年代的现实主义理论存在许多共通点，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是五四时期作为“写实”的方法论而引入的文艺理论在其后发展所达到的一个高度。本文试图厘清文艺理论由五四时期的“写实”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具体过程。为此，本文着重考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引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前，是如何通过接受西方文艺理论而逐步积淀其描写现实的方法和理论的。

## 二 清末的文艺评论——小说与社会相互影响的关系

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宣告清末小说界革命开始的文章中，“写实”一语就是以“写实小说”的形式出现的。该文章将“写实小说”与“理想小说”作了对比；而当时所谓“理想”，其意多作“空想”，故“写实小说”仅为描写事实的小说之意。只不过，该文对“写实”并未作更深入探讨，而是主要论述小说如何有助于社会改革，即小说的社会效用论。梁启超的小说效用论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即小说能够变革社会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这在该文开头部分表现得尤其显著：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故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



人格，必新小说。<sup>①</sup>

在中国，较之记录历史事实的“史”，小说又曾被称为“稗史”。如果说“史”是基于事实所作的正统记录，小说则是事实根据不明确，甚至杂以虚构的价值较低的记述。但是，到了清末，对小说的认识突破了传统，新的小说观迅速扩展。这种新观点认为，小说之所以有意义，正因为它是虚构；由于是虚构，才能够自由表达思想和观念，也才有可能变革社会。这种观点不仅对小说的意义带来了变化，而且极大影响了小说本身的读法。

在《新小说》连载的《小说丛话》中，曾有过这样的观点：

《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略）且其中短筒小曲，往往隽韵绝伦，有非宋词、元曲所能及者，又可征当时小人女子之情状，人心思想之程度，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sup>②</sup>

故意将旧小说《金瓶梅》视为“社会小说”，这种观点远远超越了传统文学观，是清末才出现的现象。在稍后的时期，这种观点更加普及，其形式更加鲜明。管达如的《说小说》这样说：

今试一观吾国之社会，则各种人所具有之心理，殆无一非小说之反映也。（略）夫小说者，社会心理之反映也。使社会上无此等人物，此等事实，则小说诚无由成。然社会者，又小说之反映也。因有小说，而此等心理，益绵延于社会。然则社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

② 平子：《小说丛话》，《新小说》第8号，1902年。